

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形式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刍议

邓小林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内容摘要】延安时期的小学教育,不仅办学形式多样,而且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材使用等方面也十分丰富与多样。在小学教育中,思想政治课程的设置及政治常识内容的教学,不仅是其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小学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上溯其源,始于中央苏区时期,下察其流,对于解放战争乃至如今的小学教育启发甚大。

【关键词】延安时期 小学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3-0170-04

一、概念与概况

陕甘宁边区称谓始于1937年5月。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保安(即今天的志丹县)的窑洞到达延安。1937年3月,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1937年5月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始有陕甘宁边区之名。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能更好的领导抗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P193)}。“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下设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2](P2)}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党在延安时期执政的象征,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执政树立了榜样。此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尤其是延安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抗战爆发之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十分重视小学教育。自边区政府成立以后,随着边区人民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等运动的开展,人民对于文化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纷纷送子女上学。为满足这一要求,边区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发展小学教育事业。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边区小学教育逐年有很大的发展^{[3](P104)}。其概况可见下表:

年代	1937 年春	1937 年秋	1938 年春	1938 年秋	1939 年春	1939 年秋	1940 年春	1940 年秋
小学校数	320	545	705	733	890	993	1341	1341
学生数	5600	10396	19799	15348	20401	23089	41458	43625

资料来源: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

抗战中后期,“1941年秋陕甘宁边区有小学1195所,学生38366人;1942年春有学校723所,学生30854人;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后,初小发展为1181所,学生34202人;1945年春,初小为1377所,学生34004人。”^{[4](P496)}

从上述内容来看,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从抗战初期到抗战中后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学校数与学生数最多的年份是1940年,而不是别的年份甚至也不是抗战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1945年。原因何在?1940年达到高峰,是否就以为此时的小学教育发展得十分顺利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反而却与该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提出的错误口号密切相关。其实,这是该时教条主义错误在小学教育中的一种表现,“当时,有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从解放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具体条件出发,机械搬用外国的‘强迫教育’理论作根据”^{[3](P107)},提出边区人民思想文化落后,不强迫他们送孩子上小学他们就意识不到重要意义,因此,在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的《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中就明确规定:“七岁至十三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课程”^{[5](P79)},可欲速则不达,这种违背实际的做法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学校数与学生数虽都多,但是其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

抗战初期,根据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小学法》的规定,边区小学的设置有四形式。《边区小学法》第二条规定,“边区小学修业期限为五年,前三年为初级小学,后二年为高级小学,合称为完全小学,初级小学得单独设立。”由此,在命名上就有了完小和初小之分。同时,《边区小学法》第四条又规定,“完全小学或初级小学办理完善的,得呈报为模范小学。模范小学条例由教育厅规定。”第五条又规定,

* 本文为笔者承担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信仰建立与路径选择:延安时期教育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WJTU11CX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邓小林(1972—),男,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师范学校和中学校附设的小学为师范学校或中学校附属小学”^{[5]P11)},即是说除了完小与初小外,还有模范小学与附属小学各一种,故共有四种。此四种小学形式,“模范小学”是边区政府着重建设的对象。就在颁布《陕甘宁边区小学法》之同时,边区教育厅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并说明,“模范小学必须以其优良质量,对其他小学起推动作用,树立小学教育中的国防教育的模范。”^{[5]P14)}这表明对模范小学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其实就在这个《暂行条例》中,对于模范小学,又具体规定了十个标准,只有达到了十条标准,呈报专门管理小学教育的县政府第三科,并经审查合格后,才能成为正式的模范小学。模范小学到学期末总结工作时,经教育厅考查,如果成绩优越,就给予奖励,相反,如成绩不好,就会被取消其模范资格。之后,随着小学教育形势的发展,关于小学之设置形式,更加灵活了。如1941年2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其第二条规定,“小学校以男女合校为原则,遇必要时得单独成立女子小学校。”^{[5]P97)}1944年8月13日,绥德分区文教会议还专门探讨了米脂女小积极参加劳军优抗的工作。在女小参加慰劳军队的工作后,军队政治部的同志还感叹地说道,“想不到这么多十七八岁的姑娘,敢给军队补衣服”,而且自这以后,“战士同志也自动的拿出衣服来,大家像一家人。”^{[5]P189)}到了1944年,更是出现了民办小学。据该年4月7日《解放日报》记载,“延市西区两个新创立的新型学校——裴庄小学和莫家湾小学,已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裴庄联合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而这两个新型小学,其性质就是“民办小学”,而这两个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校系老百姓自办”,老百姓“自己设法解决了校舍、锅灶及其他用具等,并且还调剂了两亩地给学校做农场”^[6]。这种“民办小学”后来又逐渐演变成成为“民办公助”形式。1944年7月,米脂县召开文教会议并总结民办小学经验时说道,“民丰区姜兴庄中心小学和卧羊区的中心小学,现在正准备化整为零,由完全公办转变到民办公助,把中心小学分散到各乡村”^[7]。据上论述可见,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至少大约有七种形式。

总之,不论何种形式的小学,从教学内容到教材使用,再到教学方法等,甚至小学教师的训练都体现了陕甘宁边区的特色,尤其是为了抗战的需要,小学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充满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来说,小学教育进行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过程,因为在小学教育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常识课程逐渐开设起来,通过学习,儿童们不仅了解了抗日战争,而且也为了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路径选择与信仰建立

老百姓即为大众,理论为老百姓所理解所接受,就是“化”的过程。而小学教育,虽然教育主要对象为小学生,但是小学生也是普通百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也是最为普通与基层的老百姓之一。

综观延安时期小学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其路径大致如下:

一是表现在教材的选择使用上。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

小学使用的教材除了《三字经》、《百家姓》一类旧教材外,一般学校都采用教育厅编印的课本。即使是小学的课外补充读物,如儿童文艺、儿童科学、儿童社会等读物也是经过教育厅审定的。这些课本与读物,其主要内容都是与抗战密切相关。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布的《工作方针与计划》中就明确指出,“彻底取消一切不适合抗战的课本”^{[5]P4)},这体现了当时党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有些学校,当“教材缺乏时,他们采取《新中华报》、《边区教师》一般的标语口号来作补充教材。”^{[5]P48)}一些小学“又自编以边区为内容的自然和地理的综合补充教材,和边区革命历史”为教材^[8]。有的小学,就选“解放日报上的十几篇文章为教材”^[9];“而群众报、各分区的地方报,解放日报以及新华、华北书店出版的各种通俗的小册子”^[10],都可以作为一些小学教师的参考材料和学生的课外读物。自然,从上述教材的选用来看,其政治性十分明确,因为无论是教育厅审定的教材还是自编自选的教材,其思想政治性都很强。同时,上述内容也表明,教材的选用虽然严谨,但是也体现了灵活性,尤其是让群众自编自选教材,他们体会与印象就会更深刻,也就更容易使他们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去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二是表现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1938年12月,边区政府在总结国防教育时明确指出,“为了适合抗战建国的迫切需要,应改变旧有学制,把各级学校修业期限缩短,同时应取消不适合战时需要的课程,使一切课程内容及其配备方法都以抗战建国为中心,以求学生能在最短期间内学得战时急需的知识技能,使他们一离开学校,就可以用他所学的东西来为抗战建国努力奋斗。”^{[5]P26-27)}基于此,1939年8月15日边区教育厅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明确规定,“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5]P60)},政治课程,初级小学每周六节,高级小学每周四节。1941年2月,边区教育厅对《小学规程》进行了修正,虽然在初级小学中把政治、自然、历史、地理、卫生等课程合并为常识课,但是仍然将政治课程列为首要课程,其教学时间每周为120分钟^{[5]P102)}。这些实施措施,自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小学教育的头等大事,而各类型的小学教育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来教育学生,起到了十分突出的实效性。

三是表现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上。边区教育厅1938年3月6日明确指出,“首先应该注意到统一战线和抗战政治的教育,使学生对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工作有简单的了解”;“其次就是防空防毒,反汉奸、托匪等,因为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常识,假使不注意到这些课目,是不能应付战时环境的。”^{[5]P2)}既然课程设置就是为了抗战的需要,所以教学内容也主要是为了体现这一目标。在具体进行教学时,教学内容非常丰富与灵活。例如政治课上“要把政府的法令、政策当作课程来教,使每个学生对于革命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有个清楚的认识”^[11];“政治课要着重培养学生的革命观点,使之先公后私,了解边区,热爱边区,正确的认识国共两党,内容是学生的具体的思想表现,边建常识,国共对比”^[12]。1944年6月,边区政府在谈到小学教育概

况时也指出,小学生学习了政府的法令政策后,“并随时帮助政府推动工作。去年帮助政府宣传实行农业累进税,自卫备荒、发展生产、拥军、拥政、爱民等政策法令”^[10]。即是说从教育学习了政策法规到自觉传播政策法规,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上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的过程。即使不是政治课程,是别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抗战等也关系密切。如算术课也以实际的抗战事例为教学内容,教学时有以“统计我们的战绩,去年八路军打死多少敌人,新四军打死多少敌人,一共打死多少敌人。如去年陇东分区开荒多少,关中分区开荒多少,一共开荒多少”方式来教学的,这种将教学与现实的事例联系起来,学生就更容易理解。“在历史课上,是从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始教到抗日战争,再从大革命、辛亥革命一直教上去,然后再回过头来简单的教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中间并插以生产的故事,如刘志丹、谢子长是怎样领导陕甘宁革命的,神府军区是怎样创造起来的”^[11]。这样既学习了历史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现实的革命常识,对抗战是有利的。甚至在美术课上也与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画棉花,画收割庄稼,画英勇的八路军十二次击退敌人进攻河防的图景等”^[11]。通过这些不同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小学生对于革命以及边区政权的认识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了,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四是表现在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上。因为是处于抗战的非常时期,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也非常灵活,以满足抗战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为首要条件。“就是在上课时,不一定采取课室,可以在山野中随时随地上课。学生的文具用品经常随身携带,一遇警变,立即移动。教员授课不要黑板,以石板代替,所有日用教具由教员自己携带。所谓露天学校,这种办法虽很简单,但最适用于战时的环境。”^{[5]P11}同时,废除了过去那种让学生死读书的办法,废除了那种打骂的传统的教育方式,多采用启发式的教学,而以培养和奖励学生的自觉自治精神为主,尤其是联系生活的实际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比较常见的。如有的“抗属娃娃听到了‘上学不花钱’的闲言,来找教员,于是教员带着娃娃们开了个会,先讨论什么是抗属,再谈抗日军人为什么要丢上妈妈、婆姨、娃娃们,拼着自己的血肉到前方去打仗,是舍己为群的,是光荣的,他的家属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我们对抗属娃娃的态度应如何呢,就入情入理得出‘光荣、敬爱、优待’的结论来;然后由抗属娃娃出来谈谈在学校的感受,听到的闲言,是误会就解释,是错误就批评,问题解决了,也上了一课。”^{[5]P218}而这种启发与平易近人的方式也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学生的思想也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真正实现“化”的过程。在教学时使用的语言上,“用群众的话,尤其是习惯语,来解释群众的事,他们更容易接受的,同时也可做到讲解的桥梁,如娃娃们不懂‘团结’这个名词,最后还是经过用‘不生分’之类的地方话来解释之后,才明白了。”再如“国民党不好好打日本,真是对不起老百姓”^{[5]P217},也是同样能为小学生和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语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果连语言都不能被老百姓所理解,还谈什么“化”呢?

三、历史的启示

首先,在小学教育中开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期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样起到了对小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效果,这在当时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内容中体现得很明显。《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明确规定,小学生的社会活动包括“①抗战宣传及一般改良社会宣传。②优待抗属、帮助自卫军放哨、锄奸及其他抗战动员工作。③领导识字组、夜校、半日校。”^{[5]P60}1938年12月,边区教育厅在总结一年来小学教育工作时亦专门说到,“课外活动主要的工作,有岗哨的地方,帮助放哨查路条,有抗日军人家属的地方,进行优待抗属工作。他如锄奸、动员新战士、响应政府的号召、进行各种宣传、以至宣传放足、戒烟、做小先生教识字组等等方面,都收到很大成果,如延安半年中虽抓了二百盏以上的烟灯,查获了四十五名逃兵,延川王家埧初小,十月分(注:原文为此字)抓了四五十盏烟灯,十一月分又抓了六十盏,赤水工桥镇小学,当逢集时就派学生在交通要道盘查路条,查出六十余个烟犯,后来有烟癖的群众,都绕道过去,不敢经过。”^{[5]P58}效果十分明显。陕甘宁边区赤水县的小学,组织小学生“侦察敌情,与各校互相联系等”,有的小“学生竟捉住掉队的敌兵一名,敌住李家村时,学生假装探亲的深入敌驻地,打听敌人动向,所侦察的材料还都确切。”^[13]小学生学习了放岗哨、查路条之后,在实际生活中逐渐也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实现了“化”的转变。而且“孩子们放哨很负责,来了一个老乡不拿路条,他们就挡住不让走,并让他在村子寻找证明人”,还“有一次一个同学报告说:‘张丕治家里来了十几个生人,不知是干什么的?教员马上告诉基于自卫军连部,连长就引了几个人去查,原来是附近的赌手(二流子)。于是马上抓起来,进行批评和教育’”^[14]。

但是,对于小学生要不要进行思想教育,当时还是有争议的。不过,从大体上讲,还是赞成的多反对的少。如当时“有人说:‘对小娃娃谈什么思想教育’或者说,‘即使进行,小孩子懂个啥!’”时,就有人立即反对说,“这是错误的了解,事实胜于雄辩”,并以陕甘宁边区黄龙分区小学小学生的周记为例说明,黄龙分区在解放后很短的时间,小学生的思想,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听老师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党来了,我很害怕。可是,解放军住在我村内,对老百姓很和气,吃一个鸡子还给钱买,比中央军(蒋匪)好很多,我才知道老师说谎”,“韩城一完小有一个学生,扭秧歌的时候,要他扮成蒋介石,他无论如何不扮,觉得丢人,另一个小娃娃,别人叫他美帝国主义,他气的哭起来”^[15]。这说明小学生正因为其年龄小,可塑性强,他们能够在革命教育的熏陶下很快转变过来,自然也能很快地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

其次,从娃娃抓起,对小学生进行爱国、抗战、边区等知识的灌输,不仅是当时现实的需求,进一步说这也是塑造将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下合格国民与政权建设者的需要。但是小学教育是属于基础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切忌形式主义与过火过左行为。因为从年龄上说,“小学收七至十二岁的学龄儿童”^{[5]P35},对于这样年龄的小学生,对他们进行抗

战等思想政治教育,要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接受能力。对此现象,时人也已有一些认识。并指出,“进行思想教育应根据儿童的特点与认识程度,运用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民主检讨等方式,逐渐提高,反对机械的搬用教育成年人的方法教育儿童。”^{[5]P273}1945年12月,边区新正县在检查小学教育工作时,对于不顾及儿童年龄与接受能力,采取打骂的教育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有一个姓庞的老师在平时骂学生“隔裤揣球……看你上山能日老虎”这类的话,就被当作反面例子揭露了出来并批评。1949年5月,程今吾先生在谈及该时小学生的思想教育时以阶级教育为例,找到了一份1944年以前的小学生试卷,并从试卷中发现了很大的问题,对此,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从这份试卷上可以看到是注意对这些革命后代进行阶级教育的。但所用的方法,是把革命的名词、术语、大道理向孩子们的小头脑里灌输,效果是很不圆满。我们的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曾学会了满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站在党的立场……’实际上只是鹦鹉学舌,并没有真正理解消化,在孩子的思想上没有起多大作用。这样的阶级教育,我们认为是教条主义的,形式主义的。”^[16]这样做的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小学生不能理解,更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当时边区的小学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多注重“采用启发式:启发、参观、实习、实验、讨论、漫谈、互助、竞赛,在学校可能条件下,均可活用”^[10]。保育小学的实践经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儿童节纪念大会上,有个小朋友控诉蒋匪飞机炸死他父亲的暴行,引起全场儿童的愤怒,有些孤儿想起自己的父母惨遭蒋贼杀害,下决心为父母报仇。参加驻村土地改革,听了农民控诉地主的罪恶,就当作写日记和作文的材料,进行访穷访苦,为救济灾民节约了六百斤小米等……从这些实际活动中,教育了小学生要继承其父兄的革命精神。”^[17]

如今,小学教育也为了追求高分、好名次,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是比较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是有学校注重,形式大于实际是不争的事实。革命战争年代虽然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教育内容中注重思想政治方面肯定是无可厚非,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和平时期不应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怎么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去吸取经验教训呢?这恐怕尚需学界与教育界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探讨。

参考文献:

- [1]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2]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试用本)[M].2010.
- [3]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5]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册)[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79.11.14.97.189.4.48.26-27.60.102.2.1.218.217.60.58.35.273.
- [6]解放日报[N].1944-4-7.
- [7]解放日报[N].1944-7-15.
- [8]解放日报[N].1944-3-21.
- [9]解放日报[N].1944-3-24.
- [10]新华日报[N].1944-6-3.
- [11]解放日报[N].1944-3-31.
- [12]解放日报[N].1945-7-22.
- [13]群众日报[N].1948-8-17.
- [14]边区教育通讯.第三卷第一期[Z].1949.1.20.
- [15]边区教育通讯.第三卷第五期[Z].1949.11.20.
- [16]边区教育通讯.第三卷第四期[Z].1949.5.20.
- [17]群众日报[N].1948-6-17.